

# 岭南史

著 ● 司徒尚纪

# 地地论集

●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 岭南史地论集

司徒尚纪著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4年·广州

责任编辑:冯深泉  
封面设计:邹战文

## 岭南史地论集

司徒尚纪著

\*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轻工业部广州轻工业学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4.8印张 36.3万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粤)新登字440号 ISBN7-80522-279-7/K·454

印数:1000册 定价¥13.00元

谨以此书纪念先师徐俊鸣先生(1910. 4. 17—1989. 12. 29),感谢导师侯仁之先生。

## 自序

本论集是笔者近十五年来所写六十多篇文章中选录的，除少数文章未刊出外，大部分已公开发表。主要内容为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各个方面，包括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民族迁移和人口分布、城镇兴衰和布局、政区沿革、历史文化景观与分布、旅游历史和资源利用、区域历史开发、地名研究、地理学者述评，以及编志研究等。地域不出岭南，时间从古迄今，并力图从时空结合上阐明历史人文地理在岭南产生、发展的某些断面，是以取名为《岭南史地论集》。

岭南史地和文化，自成一格。近几十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建立“南学”（或“岭南学”）之议，响应者渐多，说明岭南区域学是客观存在的。举凡反映岭南区域特色的，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都可纳入这一学术领域之内。本论集所涉及的主要方面，也当如此，并想作为引玉之砖，为建立“岭南学”作出菲薄的贡献。

古人云，悔其少作。本论集好些文章，写于十多年或几年以前，今日反观，难免失之粗疏、浅

薄或不合时宜。同样题目，如果重写，材料也许更加丰富翔实，思路也许更广阔，论据也许更加充分。但在本论集中，已不可能对旧作大事修改，除改动个别标题、提法和错别字以外，基本上保持旧日原貌。

特别要提到的是，本论集好些文章，是笔者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写成的，凝聚着我的导师中山大学徐俊鸣教授和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许多心血，在此特致感谢之忱，对已谢世的徐俊鸣教授，表示深切怀念。

由于本论集涉及领域广泛、内容庞杂、时间跨度长，又为旧作，错谬或不完善之处一定很多，敬请史地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是所欣幸。

司徒尚纪

1994年8月20日于中山大学寓所

# 目 录

## 自 序

### 一、历史经济地理

- 明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 (1)
- 明代广东经济地理文献浅论 …… (33)
- 历史时期广东农业区的形成、分布和变迁…………… (50)
- 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的嬗变 …… (70)
- 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水利事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初析 ……  
…………… (121)
- 从生产分布的历史演变看珠江三角洲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 (141)

### 二、历史民族、人口地理

- 海南岛历代民族迁移和人口分布初探…………… (154)
- 海南开发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及其对策…………… (182)

### 三、城市历史地理与建设

- 佛山历史上的兴衰及其原因初探…………… (195)
- 澳门的历史性质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影响 ……  
…………… (214)
- 浅论广州作为古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228)
- 文德路宜建设为广州商业文化步行街…………… (239)

### 四、历史政区地理

- 明代广东政区的形成及其与区域开发的关系…………… (243)
- 从建置沿革看海南岛历史开发的成败得失…………… (255)

## 五、文化地理

- 广东文化地理研究概要····· (268)
- 环境感应与客家文化在粤东北发展····· (282)
- 广州文化层次结构····· (296)

## 六、旅游历史与旅游资源开发

- 民国以前广东旅游发展史略····· (301)
- 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原则刍议····· (317)
- 长洲旅游风景区在广州东南水乡旅游线中的地位和作用····· (321)

## 七、区域历史开发

- 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摘要····· (325)
- 海南岛和台湾岛历史开发的差异及其原因初探····· (335)
- 增城县历史开发若干特色····· (353)

## 八、地名研究

- 发掘广东地名宝库,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370)
- 广州壮语地名初探····· (378)
- 广东地名的历史经济地理内涵····· (381)
- 岭南稻作文化起源在地名上的反映····· (387)

## 九、岭南地理学者述评

- 蜡炬成灰泪始干——记徐俊鸣教授····· (393)
- 吴尚时教授——华南近代地理研究的先驱····· (400)
- 中国地理学史上被湮没了的屈大均其人其书····· (410)
- 地理学名家曾昭璇教授传记····· (420)

## 十、编志研究

- 城市志体系刍议····· (453)
- 新方志的“地理志”应反映人文地理····· (459)

# 明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

## 前 言

经过宋元两代的开拓，广东经济已摆脱过去的落后状态，逐渐进入全国先进地区的行列，广东在全国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明代，广东经济更有长足的发展，在生产分布上也有许多改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进入后期，政治上的腐朽和经济上的繁荣交织在一起，生长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根深蒂固的封建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商品经济的活跃，促使许多新的经济联系应运而生。同时，明代在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地超过了前代，有些成就甚至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由于广东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它的经济活动与海外贸易关系极大，因而最先受到同时期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冲击。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分布的改变，使生产发展和分布的条件与过去迥然不同。这不但表现在明代广东经济地理的面貌具有明显的时代风格，而且使它更富于强烈的地域特色。在继承以往生产分布的基础上，明代本省经济地理又加上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它们影响深远，从而揭开了广东历史经济地理的新篇章，足供后人借鉴和研究。本文主要根据有关文献加以综合分析，希望追溯出当时生产分布的历史演变过程，再现明代广东经济地理的本来面目。

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导师徐俊鸣教授悉心指导，在此致谢。

---

· 本文是作者中山大学硕士论文《明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摘要

## 一、明代广东土地开发梗概

考察一个地区开发程度的高低，是与它的行政单位（主要是县级）设置的先后，数量的多寡，等级的升降，人口的疏密，垦殖指数的大小，耕地面积的消长，水利建设的良窳等联在一起的。综合以上有关指标，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开发的梗概。

广东在明代完成了它作为省一级行政区划，奠定自己的基本轮廓以后，内部县份有较大的增加，府县升格，反映了它们经济地位的上升。综合有关材料，<sup>〔1〕</sup>到万历年间，全省新建的县有十三个，是本省历史上建县较多的时期，新恢复的县有八个。这说明对这些地方的经营比过去积极和重视多了。它们主要分布在韩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区。（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潮（潮州府）国初只领县四，海阳（潮州）、潮阳、揭阳、程乡（梅县）。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王氏惊叹“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仁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标志着韩江流域经过有明二百余年的开发，确比以前富庶多了。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新建和恢复的县份，有顺德、从化、三水、龙门、新宁（台山）等，除了政治原因以外，与这里由于经济繁荣，内外贸易兴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地区的管理有很大的关系。明末清初屈大均指出：“昔人谓治广以狭，诚上策也”<sup>〔2〕</sup>，反映了这里政区划分越来越小，为财政收入增加的重要标志。在西江和潭江流域，增设和恢复了高明、开平、恩平、广宁诸县，在东江中上游，新设了和平、永安（紫金）、长宁（新

〔1〕 龙文彬：《明会要》卷74；徐俊鸣、徐晓梅：《广东全省沿革地理纪要》，油印本，中山大学地理系印，1981年。

〔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

丰)三县,这是本地区经济在继承前代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其他地区政区原封不动。这些地区,县治稀少,一县占地面积广大,与珠江、韩江三角洲的县份面积狭小,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差异的反映。但是,经过长期开垦,即使原来很荒凉的落后的地区,经济也大踏步前进了,例如海南岛“国初所以不立州县屯所者,盖其时黎民鲜少、山岚瘴气犹未消灭故也。方今生齿众多,土地垦开,山岚瘴气,已消灭八九分。”<sup>〔1〕</sup>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元代广东境内,无一上等县,中等县有七个,其余均属下等。<sup>〔2〕</sup>到明万历年间,广东已有番禺、南海、东莞、顺德、新会、海阳、潮阳、高要等八个中等县。其中南海县从洪武到嘉靖年间还曾是上等县。明制以税粮多少定县等级(按十万、六万、三万石划分)。珠江三角洲的中等县继元代增加。引人注目的是韩江流域,元代全为下等县,但明代已有海阳、潮阳两个中等县,表明潮州地区的经济地位确是上升了。粤北、高雷地区的县治全属下等。这些地区本来开发较早,唐宋时代还胜过不少地区,可是从元代开始,它们一些地区的经济有所衰退,到明代则更落后了。各大河三角洲和沿海的低地吸引着更多的人来开垦。西江流域元代经济虽然有所萎缩,但明代围垦的面积广大,水利建设有成就,经济还是向前发展的,县的等级也趋于升格。至于兴梅、客家地区和海南岛,县治虽然全为下等,但无可否认,由于各种因素的促进和推动,客观上有助于地区的进步。例如到明中叶,在海南岛的黎族社会,封建生产方式已取得统治地位,社会向前迈进了一

---

〔1〕 韩浚:《议平黎疏》,载民国《文昌县志》卷15。

〔2〕 徐俊鸣:《元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0年2期51页。

步<sup>(1)</sup>。

地区的开发与人口的增减和移民有很大关系。明代广东（现今省境范围）以洪武十四年（1381年）人口最多，约300万<sup>(2)</sup>，比元代增加了12.4%<sup>(3)</sup>，以后约为200万。由于政府失于对人户的控制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实际人口不止此数。这是地区开发的重要条件。人户稠密地区，往往就是经济先进地区所在。珠江、韩江两个三角洲，仅占全省面积8%左右，却集中了40%人口，为地区开发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它们当时就是本省财富之区，<sup>(4)</sup>在隋唐以来人口曾占优势的粤北、韶连地区，从明代开始，人口开始萎缩，劳力不足，成为当地经济活动的严重问题，地区的开发过程放慢了。珠江、韩江三角洲经济繁荣，除了它们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人们对湿热低地的利用改造的能力提高以外，还必须归结于人口的移动。珠江三角洲从北宋以来，南下汉人纷纷在这里定居，筑堤围垦，大力经营。韩江三角洲，宋末曾有大批福佬系居民从东部沿海移入，定居于此，地狭人稠现象在元代已经发生，明代更甚罢了。东江流域、客家山区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移民的结果。这里山多田少，耕地缺乏。宋元以前，多为畚人所居。他们刀耕火种，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宋代虽有大批客家人移入，但地广人稀局面仍未能改变。明初和明末，又有大批汉人入居，他们的垦荒活动，造成不少地区牛山濯濯。但这里毕竟条件较差，交通艰阻不便，粮食普遍不足。经过明代两百余年的休养生息，生齿日繁，乃思向外移民。明末清初，部分客家人迁往粤中和四川，即所谓“湖广填四川”运动，部分人移向海外，从

(1) 划分县等级的田赋资料见金光祖：《广东通志》卷9。

(2)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40，卷214。

(3) 《元史·地理志》，元代广东为257万人。

(4) 韩江三角洲当时已出现“地狭人稠”现象，见黄佐：《广东通志》卷20。

事工商业经营，<sup>(1)</sup> 遂使本区劳力始终缺乏，开发程度远较其他地区为逊。反之，原来荒凉落后的海南岛，明代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入居者与日俱增。据记载，元代汉人移居海南者为 17 万，明代为 47 万<sup>(2)</sup>，这在当时是一支很庞大的劳动大军。他们披荆斩棘，开垦出不少耕地，为经营海南作出了贡献。

最能综合地反映本省开发程度的是耕地面积和垦殖指数的变化。据阮元《广东通志》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广东耕地约为 2300 万亩，到崇祯五年（1632 年）已达 3200 万亩，增长了 39%。洪武二十四年，广东人均耕地，仅为 7.9 亩，只及全国水平的半数。这说明本省其时尚有大片处女地可供开拓，土地资源潜力相当大。但到明中后期，情况大变，嘉靖年间，广东人均耕地为 12.9 亩，万历年间则为 16.1 亩，而相近期内，全国人均耕地却下降为弘治四年（1491 年）的 11.7 亩和万历六年（1578 年）的 11.6 亩。据此可以认为，广东开发步伐大大加快，走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sup>(3)</sup> 况且这时瞒报土地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嘉靖以后，“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广东失额尤多……非欺隐即委弃于寇贼矣”<sup>(4)</sup>。据此可知尚有不少被开垦的土地未计算在内，这可作为田亩增加的佐证。广东垦田最多是万历二十八年约 3235 万亩，全省平均垦殖指数为 10.6%，但各地不一，以两大三角洲较高，约为 40%，最高顺德县为 77%，这主要是桑（果）基鱼塘区建立的结果。垦殖程度从三角洲中央向边缘和外围降低。粤北、兴梅和五指山地区开垦最差，不少县份垦殖指数在 5% 以下。东江、西江、

(1)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1933 年，广州，希山书藏。

(2) 陈铭枢：《海南岛志》第 62 页，日文版，1936 年。

(3) 有关统计数字，参看金光祖：《广东通志》，姚虞：《岭海舆图》，梁方仲：《明代户口及田赋统计》，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3 卷 1 期。

(4) 龙文彬：《明会要》卷 53，田制。

北江两岸谷地、雷州半岛台地的开发处于中等程度，一般为 15%。统计表明，本省有一半左右的面积，44%的县份，垦殖指数分布在 5—10%左右。垦殖指数的其他级别的分配并不很集中，这种情况反映了本省地貌类型的多样性和分散性，以致开发参差不齐。但本省丘陵山地比重很大，利用比较困难，又与 5—10%这个指数占优势是相对应的。<sup>〔1〕</sup>

明代广东耕地的增长，主要途径是围垦河滩、沼泽、海涂、利用沙田、开辟梯田（畚田）和改善耕作条件等来实现的。珠江三角洲明代已进入最重要开发阶段，被围垦的荒滩河段，分布在西江干流两岸，羚羊峡附近、西江、北江、绥江以及它们的支流如新兴江、粉洞水、青岐水、芦苞涌、西南涌、官窑涌等河流的交汇地带，还有东江下游三角洲，连低洼沼泽亦不例外。据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二）统计，明代三角洲筑堤总长约为 220399 丈（约为 735 公里），凡 181 条，捍护耕地万顷上。在雷州半岛，围垦海滩是扩大耕地的重要手段。雷州“平时潮水利于田亩，惟飓风发则咸潮逆起，稼乃大伤，故东洋田俱筑堤岸以遏之”。<sup>〔2〕</sup>这里从宋绍兴年起，就开始沿海筑堤，“包滨海斥卤之地，垦田数百余顷”。洪武四年（1371 年），海康、遂溪两县联合筑成海康南北大堤和遂溪堤，总长 145 华里，水闸 75 个。嘉靖年间，大堤溃决，修复决堤时，海康出动人力 24800 人，遂溪 12600 人。动员人力之多，当时确是惊人。<sup>〔3〕</sup>这两条大堤与宋代修成的水利工程构成灌溉系统，使得“雷郭外洋田万顷……岁登则米粒狼戾，公私充足”，<sup>〔4〕</sup>雷州半岛成为明代广东输出粮食最多的地区。据有

〔1〕 垦殖指数计算来源见金光祖《广东通志》卷 9，均为万历二十八年数字。

〔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1。

〔3〕 嘉庆《雷州府志》卷 18，《李义壮捍海堤记》。

〔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地谱。

关资料统计，宋代广东修筑堤围为 44 宗，元代 35 宗，到明代增加到 302 宗，而清代也不过是 165 宗。<sup>〔1〕</sup>可见明代的围垦在广东（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开发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事件，其中屯田又是垦田方式之一。明代军、民、商屯遍布边疆内地。对于广东，“今屯田之在岭外者，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可谓沃壤。而濒海之地，东会溟涨，百折迥互，瞬息隧代，增淳卤，利倍农穡，亦足以殷家邦矣。<sup>〔2〕</sup>”弘治十三年，“广东都司并所属卫所屯田共 700232 亩，有耕牛 402 只”。<sup>〔3〕</sup>按黄佐《广东通志》材料，明中期全省屯田凡 585 处，分布在各地，以广州、惠州两府最多，其中许多沙田的开垦和耕种，是军屯负责的。明制，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广东各卫所的屯所，可考者共三百五十三”，<sup>〔4〕</sup>散布全省各地。按黄佐《广东通志》明中期，全省屯田纳粮为 95381 石，相当于一个上等县夏秋两税，到万历初，为 150129 石，增加一半。<sup>〔5〕</sup>惟“万历以后，承平日久，初制尽废，屯田既不堪实用，屯田亦徒有虚名”<sup>〔6〕</sup>。但他们的垦田成绩，是不能抹煞的。

耕地面积的增长，又往往是兴办水利，改善耕作条件的结果。明代广东除上面所说的大规模围垦以外，各地修建的陂、塘、湖、圳、沟、井、池、泉等水利设施，星罗棋布。据统计，万历间共 874 宗，受益面积约 80 万亩，<sup>〔7〕</sup>占耕地面积 25% 左右，两大三角洲比例尤大。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它对本省水稻等农作物的生产

〔1〕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17 页，三联书店，1957 年。

〔2〕 黄佐：《广东通志》卷 26。

〔3〕 同上书，卷 36。

〔4〕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187 页，中华书局，1965 年。

〔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36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6〕 乾隆《潮州府志》卷 37。

〔7〕 郭棐：《粤大记》卷 29。

和分布起了保证作用。灌溉比重大的地区，都是水稻和经济作物重要产区，农业生产精华所在。

广东丘陵山地占了总面积70%左右，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历代都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而明代在这方面却有了新的途径和发展。这就是新作物品种引进和传播。明代中西交通已进入一个新时代。许多新作物，如番薯、玉米、花生、烟草、菠萝、南瓜、甘蓝、辣椒等先后从海道传入我国，而广东、福建为首途之区。这些作物，对自然条件有不同的要求，许多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地，现在找到了用处。特别应指出的是番薯，它作为一种喜温耐旱作物，有许多优点，拥有巨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它“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皆可以长，粪治之则矣”<sup>(1)</sup>，明后期已成为当地人民重要食粮，或曰“闽广人以当米谷”<sup>(2)</sup>。本省广大台地、丘陵、低山及其他零星土地，大片被后来西方地理学家称为“红色沙漠”的红壤和砖红壤等迅速被番薯等作物占领，得到有效的利用。这在历史上是未有过的盛事。尤其是它可以利用许多闲置的山坡旱地种植，故能腾出更多的土地来发展经济作物，解决当时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争地的矛盾，使得过去种水稻的地方，有可能改种经济作物，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经济作物专门化种植区的出现。这使得本省的土地利用，地区开发过程涂上更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特色。

必须指出的是，有些地方，由于过度毁林开荒或烧炭，即使在当时，已经出现破坏生态平衡的严重后果。例如从化县，“流溪地方，深山绵亘，树林翳茂，居民以为润水山场，二百年斧斤不入。万历之季……异方无赖，烧炭利市，烟焰熏天，在在有之……”

---

(1) 周亮工：《闽小记》卷3。

(2) 王象晋：《群芳谱》，转引于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3期187页。

不数年，群山尽赭。山木既尽，无以缩（蓄）水，流溪渐涸，田里多荒。奸民蹈一时小利，而貽不可救之大害”。<sup>〔1〕</sup>又康熙《香山县志》也指出：“故香山自梅花以东，南台以南，多深山大林，或穷日行，里翠蒙蒙，杳无人迹。嘉靖中，异县豪右，纠集乡民，无所不到，其巨木以为材，其杂木以为炭，获利甚富，趋者日众，台以南山渐童，而焚炭之气，与日争赭矣”。这是盲目毁林烧炭遭到大自然报复的最好例证。

广东濒临南海，大小河川遍布，向水域进军，索取更多的食物，这是明代广东人民利用自然富源的重要方面。除了在珠江三角洲兴起桑（果）基鱼塘和其他地区养鱼以外，海洋捕鱼业有进一步发展，南海大陆架是本省最大渔场，渔民的活动，已不限于浅海，而驱驰至深海了。据《广东新语·鳞语》所载，当时使用的渔具，不下十余种，用于浅海拖网作业的叫罟，由六、七十艘渔船联合操作，每日捕鱼数百石；用于深海作业的纛罟，“相连数百罟，以为一墙，横截海水……起罟时，鱼多不可胜数”。这些捕鱼方法，沿用至今。

总之，明代的广东，有许多昔日的莽莽荒原被辟为耕地，种上各种庄稼。象兴梅、海南岛等一些过去人迹罕至的山区，也有了新的主人。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与江海争地，向荒山要粮，向海洋进军，从大自然那里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因地制宜，各得其所。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已非昔日可比。这一切标志着明代的广东，在自己的开发史上已揭开了新的一页，使以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分布面貌，亦为之一改旧观，为明代广东经济地理的新变化，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

〔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8。